

李世民 朱熹



世 界 巨 人 百 傳

李世民

(597—649)

林 怡 编著

唐太宗李世民治国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他笃信儒学，对佛道不感兴趣。首先，他利用儒学加强教化，以齐风导俗，安定人心，其次，他主张恤刑慎罚。轻徭薄赋，节己顺民，发展生产，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些做法正是儒家“仁政王道”的民本思想。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贞观政要·论任贤》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贞观政要·论君道》

总 序

张民权

这套丛书编写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的传记。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很多,这套丛书只选取了较有代表性且兼顾各个历史朝代的十位思想家。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和庄子,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李世民,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十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不过在一般历史学家眼里,唐太宗李世民是算不上“思想家”的,然而我们认为,李世民的政成就是正是孔孟学说中“仁政王道”及“民本”思想的体现。宋代思想家陈亮就是这样认为的。李世民写的《帝范》和《贞观政要》所叙的君臣言行,实际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再则在唐代还没有真正自成体系的思想家。所以我们选择了李世民来写。这十位思想家,除庄子外,其思想仍以儒学为主。这也是我们选材系列上的考虑。之所以选庄子,一方面是因为庄子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确实很深远;另一方面,庄子思想中追求理想人格的精神,在某方面又补充了儒学当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心灵哲学,它后世帮助儒家抵抗和吸收消化外来的思想(如佛教),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流派纷呈,绵延漫长。而以儒家为主线的政治思想史,在各个时代,又表现为不同的派别和表现形式。为帮助青少年对儒学有个全面的认识,我们在此不妨对儒学在各个时代的历史发展,于大关节处作个简略的介绍。

先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它实际上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以来,人类优秀文

化和思想的总结。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其中心是“仁”。“仁”是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哲学范畴,大致包含了西周以来的礼仪宗法制度和处理伦常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的心理文化结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具体说来,“仁”学内容大致有三:一是“孝悌”和“忠恕”,这是处理伦常关系的基本准则。“孝悌”是所谓父慈子孝,兄弟家庭和睦,尊敬长上,服从等级名分关系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亲亲”、“尊尊”。“忠恕”简而言之就是待人以诚,推己及人,人与人之间应当竭诚相待,尽己之心。其二是“德政”、“礼治”和“教化”,这是就社会制度和政治理想而言。孔子反对“暴政”,更反对对人民的“不教而杀”,强调当政者应当“为国以礼”,“政者正也”,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言,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篇)。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这就是说,当政者如果仅仅靠政令和刑罚来统治人民,人民就会巧诈迎合,虽可苟免于刑罚,但心里不诚服而无愧耻之心。如果以道德和礼义去教化人民,人民就会心悦诚服而有愧耻之心,且知道自我修养并规正自己(道,同“导”。齐,规范。格,规正。句中“之”指代“民”)。在《论语》里,这样的言论是很多的。“仁”学的第三个内容就是“中庸”思想。这既是待人处事的一种准则,同时也是为政者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中庸”就是做事情要不偏不倚,调和持中,不能走极端,“过”和“不及”都是不对的(“过犹不及”)。以上三方面就构成了儒家学说的主要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因而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孔子没后,全面继承儒家学说的是孟子(公元前390—前305)。他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门人的弟子。孟子对孔子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主要表现为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王道”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既然人有这四种善良本质,那么,统治者加以引导,施以仁政的话,是可以实行“王道”的。“王道”的基本内容就是天下太平,人民都有土地,有房屋,所谓“五亩之宅”、

“百亩之田”，从而老百姓都有饭吃，有衣穿，懂礼义，而不是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的穷奢极侈，而另一方面是人民的妻离子散，“野有饿殍”的悲惨生活。孟子一再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都是孟子思想中的精华。后来人们以孔孟合称，以代表儒家学说，因为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乃至秦汉之初，各种思想流派纷争，所谓“百家争鸣”，诸如道家、墨家、农家、名家、法家、杂家等等。儒家思想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汉武帝即位后，随着国力的强盛和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大一统的帝国需要大一统的思想，以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这时候儒生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绵延了两千余年之久。董仲舒对儒学加以改造，并吸收了先秦以来各家学派的观点，使之统一于儒学之下，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主要表现为以“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论。另外，他还建立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封建时代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五常”就是“仁义理智信五常之道”，这是君臣上下、朋友之间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原则。这套理论奠定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基础的封建宗法思想，成为束缚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的“四大绳索”。

由于董仲舒的学说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后来蜕变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谶纬神学。王莽篡权及刘秀做皇帝，都利用了这种神学。从而使儒学变得神学化、庸俗化。东汉时期的桓谭、王充以及王符、仲长统等人都对这种谶纬神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儒学从此也失去了它往日的“独尊”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魏晋以后的玄学。

玄学以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人为代表，主要表现为以老庄的天道自然来论证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以道释儒，儒道结合，目的在于为门阀士族的统治制造理论依据。在外部形式上，它以老庄思想为基础，崇尚自然无为，宣扬达生任性，并且不拘礼法，生活放荡。魏晋之时（之

后)的文学家,大多受玄学影响很深,他们多以生活放荡的形式来表示对当政者的不满和消极反抗。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尤其是经过南朝梁武帝的倡导,更加肆行无忌。而儒学更处于次要地位。隋朝统一后,王通倡导儒、佛、道三教合一,这时隋文帝派专人征集和搜罗儒家经典,进行分类整理。儒家经典于是开始受到重视。

儒家的真正复兴是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留意儒学,尊孔丘、颜渊为“先圣”、“先师”,并命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考订注修五经(《诗》、《书》、《易》、《礼》、《春秋》),颁行天下,把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一扫而空,使儒学重归于一统。科举考试也注重经学,明经科专习儒经,进士科也习儒典。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认为是儒生。有所议论,一般都不敢违背儒家经典。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儒家思想统治在唐代的加强。而唐太宗治国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他笃信儒学,对佛道不感兴趣。他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佛教),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戒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资治通鉴》)梁武帝佞佛,昏愚腐朽,直接导致了“侯景之乱”(548—551),这次社会破坏并不亚于唐代的“安史之乱”。梁武帝自己被乱军困围,饿死官中。而其子元帝萧绎又重蹈父辙,为北周军队所围,“犹讲《老子》”,其昏庸如此!

作为一个帝王,李世民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孔孟之道。首先,他利用儒学加强教化,以齐风导俗,安定人心,上文所述重文兴儒之事就是例子。其次,他主张恤刑慎罚。轻徭薄赋,节己顺民,发展生产,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同上)这些做法正是儒家“仁政王道”的民本思想。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以推行儒教而兴国,而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来,以玄学、佛教

而致使天下祸乱,国家分裂,一个个朝代短命而衰亡(当然还有其他内部外部原因)。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然而李世民的子孙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笃信佛教,轻视儒教。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一蹶不振,人们精神空虚,只好求福于释迦牟尼,以求来生的幸福。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命人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内供养,于是天下信佛风靡从之,僧尼和寺观遍布全国。一些有识之士颇为忧虑,因为一个男丁的出家为僧,就意味着国家的赋税减少,土地因缺少劳力而荒芜。中唐以后,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士子,如: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极力反对佛老之学,倡兴儒学。韩愈以孔孟继承人为居,从儒学出发,创立“道统论”和“性三品说”,来抵制佛教。韩愈向宪宗上《论佛骨表》,极力论证佛教的虚妄性和欺骗性,指出历史上凡是佞佛的帝王,必然是个积弱积贫而又愚昧落后的朝代,“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要使国家强盛,国泰民安,只有振兴儒教。韩愈因此忤怒宪宗而流放岭南。这实际上是儒家思想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与外来的佛教思想一次重要的斗争。我们说,佛教思想是不可取的,而伴随它来的音乐、绘画、雕塑等文化艺术,却是对汉文化的补充。

韩愈的“道统论”对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时候国家又重新统一,需要统一的政治思想。鉴于佛道之学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人们又选择了儒学。这时候理学便应运而生,它是在儒学基础上加以改造并吸收了佛道学说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儒家思想哲学派别。理学又称道学,它创始于北宋时代的周敦颐、邵雍、张载及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认为,在客观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理”的存在,它是宇宙的本源。至南宋中叶,朱熹集其大成,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发展“性即理”之说,认定“理”先天而存在。引而申之,一切现存的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及伦理关系都是“理”的存在。人必须遵守它,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依据。由于理学过分强调“理”的客观存在,而否定人的主观思想的存在。所以程朱理学在明代受到冲击。

这时候产生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的“心学”。

王阳明是明代中叶人。他发展了南宋时期陆象山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用“心学”来反对程朱理学。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一切都是我感知的结果,我思故我在。王阳明把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另外,王阳明还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这些学说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翕而从之,以至后来在日本等地学术界都影响至深。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与明代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状态的变迁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程朱理学把伦常道德置于“天理”之下,灭绝了人的感情欲望,长期以来,给社会造成了一种窒闷和压抑感。而心学则把伦常道德关系建立在个人的感情欲望、利益和幸福的现实生活基础上,而这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心学也就应运而生。

王阳明的心学与宋代程朱理学的实质都是唯心主义,是同一个哲学体系的两个派别,所以人们把它们合称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在明代后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就是士大夫束书不观,学问空疏,整天盲心盲性盲理,高谈性命之学而于现实生活实际不作研究,平时读书只读一些道学家的语录,从而把一个好端端大明帝国也空谈掉了。从此,宋明理学也走到了尽头。

明朝灭亡以后,许多学者痛定思痛,对宋明理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和批判。他们重新回归到原始儒学中(即孔孟学说),对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利弊关系作了深刻的总结,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儒学。这种新的儒学不再把君臣关系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原则,而国家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主要弊病。这种新儒学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他们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都有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当明朝灭亡,清兵南下的时候,他们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出生入死,屡遭清廷迫害。晚年,他们潜心著述,思以经学救国,希望

能从历史典籍中总结出民族性的精华,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他们思想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君主专制的怀疑和批判,对封建制度中极不合理的东西以及落后的思想意识的批判。顾炎武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它们的实质与魏晋时期的玄学空谈一样,而祸害更烈,当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而今清谈“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对封建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对君权制度表示怀疑,提出了“保国”与“保天下”这样一个命题。顾炎武认为,“亡国”是某家某姓皇帝的改朝易号,那是君臣的事;而“亡天下”则是整个民族的危亡,那是每个民族成员的事,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建立了近代政治思想,它对君主专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提出要改变“君为臣纲”的关系,设想了相当于近代西方议会制度的“宰相”(内阁总理)理政和“学校”(议会)议事制度。对君主的权力应当限制,国家大事应由宰相和学校来议定,而不是以君主是非为定。这个思想是非常大胆的,而表述这种思想的《明夷待访录》也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王夫之的重要贡献是建立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以“气”的唯物论驳斥了宋明理学所谓“理”为宇宙本源的荒谬。王夫之对君权制也提出了怀疑,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参见《读通鉴论》)。他说:“天下非一家之私”,“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然而,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它被淹没在封冻的清朝旧理学之下,经过两百多年以后才终于复苏。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章太炎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以他们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和推翻清廷反动统治的旗帜。在这里,我们不妨引述一下梁启超先生当时的评论:

“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我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 and 这个束缚思想、侵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过来。他们

有些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灰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

这就是三位思想家的启蒙作用和影响力。

这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史。最后我们要指出的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地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甚至推动历史的前进,但有时却起着消极反动作用甚至阻碍历史的发展。例如宋明理学家的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千百年以来,使多少妇女惨遭其祸,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有的在孤寂长夜中煎熬一辈子,而顾炎武的母亲(嗣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未婚守节,最后得了个“贞孝”的牌坊而被载入“史册”!因此,我们对古代的思想流派要一分为二看待,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就儒家思想来说,其主流还是可取的,其中的精华我们现在还借鉴吸收着。儒学还在发展,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我们现在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儒家思想的延伸。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主要是帮助青少年朋友对我国古代的儒学为主线的思想史有个初步的了解,并了解这些思想家的生平经历,这样有利于我们的成才和成长。了解我国古代思想史及思想家的经历,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早在世纪前的六世纪,我们的祖国就有孔子这样一个大思想家,世界上此时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比儒家思想更早更完备更有体系的哲学思想。古希腊的思想家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前370)和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比孔子晚一百多年。而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与孟子是同时代的人。不少外国学者就直接把庄子说成是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而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底蕴是非常丰厚的,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笔不仅是属于我们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历史遗产。让我们好好发掘这一笔遗产,为我们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希望所在。

前 言

唐太宗李世民（597—649年）^①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智帝王。他年仅十八岁就领兵征战，二十岁时力劝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攻入长安；二十一岁被封为秦王，挂帅亲征，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励精图治，举贤纳谏，崇俭务实，强武修文，开创了国富兵强、海内升平、威及四域的“贞观之治”。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一向被后代史家推崇赞誉。作为一个杰出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治国思想。政治方面，在君民关系上，他认识到“君”像船，“民”犹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因此，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① 关于唐太宗的生年，所见当代有关唐太宗介绍的文籍尽作公元599年，疑相互抄袭致误。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太宗死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享年53岁，依此逆推，太宗生年当为597年。《贞观政要·论慎终》记载贞观九年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自述功业时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太宗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奠定了唐统一天下的局面，时在公元621年，即帝位在626年，逆推，唯生于597年，才与他自述的年龄相符合。

作为最高统治者，制定的国策必须先替百姓着想，做到“与民同利”，惟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官吏队伍建设上，他任人惟贤，要求官员廉洁奉公、勤勉政事、明辨是非、赏罚得当、关心民间疾苦。他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要求各职能部门因职设官，精简人员，互相监督，提高行政效率。经济方面，他强调以农为本，大力推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使民生富足，社会发展。军事方面，他推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强兵壮武，开土拓疆，巩固了边防。民族关系方面，他采取了对各民族无论大小平等如一的政策。他自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发展。文化方面，他推崇儒学，奖掖文士，重视对前代历史经验的总结，力图“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他的文韬武略，使隋末唐初以来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疆域拓广，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

作为一世雄主，唐太宗思想的深刻最主要表现在他意识到不受约束的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力是危险的，因此，他竭尽全力引导臣僚们相互诤谏，取长补短，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从谏如流。在中国漫长的君主集权的“人治”历史上，唯有唐太宗自觉地不遗余力地设法在“人治”的政治体制格局中尽可能充分地公正地发挥各种“制度”、“法理”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唐太宗晚年也难

逃“人治”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历史宿命：因为接班人选——太子的废立造成了新一轮的父子兄弟的同室相煎、反目为仇；因为逞个人意志而置众人劝谏于不顾，亲征高丽却劳而无功……唐太宗晚年的教训表明：在以“人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中，理性的法理制度即便一时在理智的强权思想指导下得以贯彻实践（如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早期），但最终都难逃被至高无上的不受制约的帝王权力“异化”的命运。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奉献给青少年朋友的这本有关唐太宗的小册子能够带给正在走向 21 世纪“法治”社会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一点感动，一些思考。

林 怡

1998.9

目 录

前言	1
1 指点江山 逐鹿中原	1
2 同室操戈 问鼎帝位	8
3 居安思危 从谏如流	23
4 礼贤下士 惟才是用	35
5 崇俭务实 修明法度	46
6 文治武功 与民同利	60
7 英雄遗恨 千古为鉴	77

1 指点江山 逐鹿中原

公元 589 年，隋灭陈，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从汉末以来近四百年的分崩动乱之后，终于又迎来了大一统的盛运。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继承了西魏宇文泰、苏绰等人倡导的崇俭尚实的作风，精于吏治，使隋朝的国库日趋富足充盈。在他的末年，隋国库包括粮食在内的财富足以供后世消耗五六十年。公元 604 年，杨坚去世，他的次子隋炀帝杨广继位。杨广坐享江山，在他统治的初年（公元 606 年），隋朝已拥有户数八百九十多万，人口四千六百万。炀帝自恃国富人多，一上台就着手营建工程浩大的东都洛阳，每月征用民工两百万人，搜敛全国各地的奇材异石运往洛阳。他在位十四年，留在京城长安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横征暴敛、游山玩水和穷兵黩武之上。为了显示大一统的气派，也为了能够更方便地搜刮各地的财富，更为了能够常年游幸江南的好山好水，他在位期间，开凿了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中经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北到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全长达二千多公里。公元 612 年以后，他又连续三年发兵数